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杨建新 ◆ 主编

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研究

ANDUO ZANGQU ZUJIGUANXI YU QUYU WENHUA YANJIU

刘夏蓓/著



民族出版社

China

ANDUO ZANGQU ZUJIGUANXI YU QUYU WENHUA YANJIU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杨青



ISBN7-105-05692-4

9 787105 056927 >

ISBN 7-105-05692-4/C · 66

(汉52)　　定价：19.80元

China

C80·754/1

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研究

刘夏蓓◆著

民族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500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刘夏蓓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ISBN 7－105－05692－4

Ⅰ．安…　Ⅱ．刘…　Ⅲ．①少数民族－民族关系－研究－安多②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安多

Ⅳ．K280.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5266 号

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研究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9.25　字数：230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19.80 元

China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编委会名单

主　任：杨建新

副主任：马曼丽　王铁志　吴福环

编　委：牛汝极　王希隆　王洲塔
杨　青　孟　楠　高永久
徐黎丽　黄显辟

China

序

杨建新

早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兰州大学几位青年教师就开始了西北少数民族历史和西北地方史的教学和研究。那时候搞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少，资料缺，经费更缺，形不成力量，但几个年轻人对此兴趣很浓，抱着咬住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拳打脚踢，立志要在民族研究方面做出一番事来。好日子不长，没过几年，一场文化浩劫袭来，一折腾就是十年。在这十年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机会：那是70年代初，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国务院安排一些学校抽人力组织编写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史书，西北几个院校接受了这一任务，着手编写一部《沙皇俄国侵略西北边疆史》，兰州大学承担了1840年以前中国西北边疆历史、民族、边界等问题的研究。这个任务促使学校抽调一些原来搞过西北少数民族研究的教师和有关人员，在“文革”中，投入了研究工作。以此为契机，兰州大学的西北少数民族研究工作，在中断了六七年之后，再次得以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驾着改革开放的风帆，激流勇进，驰入了民族研究的主航道。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取得了民族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了民族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01年兰州大学成立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并被教育部批准，与新疆大学联合建立“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

China

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02年西北少数民族研究又被列入兰州大学第二期“211工程”建设项目。

研究基地的建立和入选“211工程”，为兰州大学少数民族问题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十分优厚的环境和条件，使兰州大学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至今已经建立起了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职科研队伍；形成了培养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体系，每年仅在校博士生即达50余位；形成了以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历史为特长，全面研究西北少数民族问题为特色，以及研究民族学、民族理论各方面问题的学科群体。

随着学科的发展，我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的成果日益增多。目前我中心已经组织了《西北少数民族通史》（共13部）、《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研究丛书》（共10部）、《中国民族学丛书》（共6部）等系列专著，并已陆续出版。根据我中心目前情况，我们又组织了另一套丛书——《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拟将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的有关学术著作及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经过筛选，编入《文库》正式出版。本《文库》是一个研究性的、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她有起始的时间，但不一定有终结的时间，只要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学术上繁荣昌盛并长期存在，我们这个《文库》就会不断有新著加入。我们希望《文库》能为中国民族学学术繁荣和创新做出贡献，既是展示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成就的一个平台，同时也能成为培养民族学新生力量的摇篮。

祝愿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不断发展壮大！祝愿中国民族学学术研究繁荣昌盛！

2003年6月于兰州大学

China

导　论

一、研究界定与研究意义

1. 研究界定

本研究属区域民族关系与区域文化研究范畴，是西部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与民族关系研究大背景下的一部分。本研究所及的地域范围——“安多文化区域”[①] 为历史与现实“共同文化传统[②]占有的共同生态处所”，由于该生态处所空间范围的历史变迁、行政区划与本土认同之间的差异，给本研究地域范围所带来的空间变化使安多文化区域所指范围的改变，因此，本文在第一章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了界定，安多地域的空间范围可分为本土认同的“多康六岗”、“安多马区”；研究者所构建的结构意义空间和变动剧烈的行政区划空间，其中行政区划空间就包括：形成时期的“空前广大”；巩固发展时期的“脱思麻宣慰司”辖区；明代的“西番诸卫”；近代以来的“郡县化”和近代以来的“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青海大部”藏族地区的不同空间范围及其变迁。在时间上，由于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为安多藏区的族际关系与区域文

① 指安多以藏文化为主，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系统所占有的共同生态处所。

② 指以藏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特点。

China

化，而该区域文化与族际关系格局的形成均始于唐朝，因此，本研究的“历时研究”部分开始于唐朝。在方法上，本研究主要以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理论研究与个案支持相结合的方法。同时，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与系统分析逻辑比较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从不同侧面剖析了安多族际关系的类型、格局及其内在规律性；解析了安多区域文化的成因与特征：结构性地诠释了安多三大文化区及其独特的文化现象。严格地说，本研究的许多田野工作与研究专题应属于“再研究”的范畴，但本研究并未采用“再研究”一般所注重的“追踪式”、“变迁式”的传统研究思路，而是将安多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区域，系统研究其整个社会文化的结构，研究其变迁中“不变”、“巨变”中“缓变”的文化因素，并注重“反思性继承”和“田野工作的继承性开辟”，因此，使研究的“学术史意义”更加突出。鉴于本研究首次将安多的空间研究、族际关系类型研究和文化结构研究等引入区域族际关系与文化研究之中，对构建区域文化与族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因此，本人认为该项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学术价值

本研究的主体安多藏区是一个以藏民族为主体民族、藏文化为主体文化，多民族聚集，多元文化共存，多种宗教信仰共生的“众神狂欢之地”和西部著名的“民族走廊”。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西北各个民族、各种宗教、各类文化均交汇于此，这里既有民族间的交流、传播、融会与聚合，又有对峙、摩擦、隔阂乃至于兵戎相见。在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都有一些民族进入该地区，从而引起一系列民族间的互动与重构。“几千年来，民族迁徙与往来的相互关系史，为黄河上游地区积淀了十分深厚丰富和复杂的多民族的文化背景与族源基因。……宋元以降，在黄河上游地区还逐渐形成了数教并行的格局。这对现今这一地

China

区的汉、藏、回、蒙之间的民族关系也留下了至关重要的遗产”①。因此，系统研究安多藏区的族际关系类型、格局、区域文化结构及独特的文化现象对探寻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的普遍规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学术价值。

安多藏区不仅聚居着众多的民族，还汇聚了世界三大宗教中的佛教、伊斯兰教，同时该区域还有萨满教、苯教等原始宗教遗存及各种民间宗教信仰、仪式等。多种宗教思想和宗教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采借、整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汉文化区，以伊斯兰教教义为核心的穆斯林文化区及以藏传佛教为支柱的藏文化区和受它们辐射而形成的三大文化交融的“亚文化区”，并先后经历了整体性的“吐蕃化”、部分地区的“蒙古化”、“伊斯兰化”过程，文化的诸种现象一应俱全。因此，安多又是研究宗教、宗教文化、宗教观念等宗教发展规律的理想之地，也是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田野”与研究工作应关注的重要地区，具有“再研究”的学术意义和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3. 理论意义

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文化研究的理论浩如烟海，但并不是说它们就是解决各项研究专题的数据库，具备我们直接“复制”的学术资源。如在文化变迁研究专题下的弗朗兹·博厄斯的《人类与现代生活》、克莱德·伍兹的《文化变迁》、C·恩伯 M·恩伯的《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爱弥尔·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理论著述中，仅“适应文化”在变迁中的时间规律性问题，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巨大的分歧。至于本研究所涉及的“文化圈”、“文化区”、“文化系统”、“文化特质”等理论，现有的理论都不能

① 周星：《黄河上游区域多民族格局的历史形成》，载《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第39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China

直接用来解释安多文化区域中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因此，本研究以个案研究支持理论研究的思路；用民族志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对西方传统文化理论进行反思性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我国区域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对于我国民族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分属甘肃、青海、四川三省的安多“文化区域”，30余个少数民族和多个具有跨民族文化特点的族群，在安多藏区聚集而形成不同的民族区域和区域民族文化，使藏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安多文化系统内生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化灶”①，进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这恰好印证了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和而不同”的理论，同时对深入研究费老“多层次民族认同”而形成的民族内部文化的多元性理论，探讨区域文化的多样性根源，构建区域族际关系类型与区域文化多元性理论研究框架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深入系统地研究安多藏区的族际关系和区域文化，揭示该区域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规律，也是藏学研究的需要。藏学这个有着广泛世界影响的综合性学科，在我国起步后已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从目前我国藏学界所研究的藏区地域看，重西藏轻安多的现象极为突出，无论是在选题取向和研究的深度、广度上安多都无法与西藏相比，安多藏区研究的相对滞后，使藏学研究工作进入了“以点概面”的误区。就人文环境而言，是安多藏区、康区、西藏共同构成藏族文明的生存空间，它们是共同的文化传统占有的共同生态处所，在藏族的历史和发展中，不同的区域发挥着自己不同的作用，没有对安多和康区全面、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刻理解藏

① 指文化形成的中心地区，文化从此处向外扩散，通过接触加速文化的借取过程。本文有关文化概念的定义均参见陈国强主编的《简明人类学词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以后不再单独注出。

China

文化自身的多元性质及其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也看不清藏文化的全貌，因此，系统研究安多藏区是藏学研究理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本研究的理论价值所在。

4. 现实意义

由于地理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吐蕃从青藏高原崛起后，一直坚持不懈地“东向发展”①，藏文明的重心逐渐东移，因此而形成的安多藏区对于整个高原的作用日益突出。其自唐以来，安多藏区就成为吐蕃与中央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元、明、清三朝，又发展成为中央王朝经略整个藏区的桥头堡和治藏政策的示范效验区。近代以来，藏族文化重心东移更趋加速，继七世达赖之后，又有九世、十世、十一世等三位达赖出自安多藏区。改革开放20年来，该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之快，变迁之剧烈令人瞩目，可以说，安多藏区已成为整个藏区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晴雨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系统研究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为制定可操作的维护藏区稳定与发展的政策提供参考就使本研究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寄希望于安多藏区发挥其历史上的特殊作用，成为整个藏族跨入现代化的先行者和探索区，他热切地盼望安多藏区能为整个藏民族走向现代化再现辉煌。

另外，安多藏区不仅是一个文化的多元地区，而且其经济发展亦呈多元态势，历史上不同生产方式下形成的不同经济文化类型，有许多在这里保留着。如：畜牧经济文化类型；林业经济文化类型；半农半牧经济文化类型；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和手工业、商业经济文化类型。这多元的经济类别，正是安多多元文化根植的基础，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国学术界提出的从东北到西南存在着一个半月型文化传播带的观点，这个传播带正是农耕文化

①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China

和游牧文化的重合和转折点。这些经济文化类型在这里相互交流、借鉴、自我调适同时又产生了数十种亚经济文化类型和次经济文化类型。在比例上，各类经济文化类型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结构上，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内部构成形成了不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自我调适、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也是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深层原因。因此，系统研究安多藏区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自我发展能力”① 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因此，本书对于研究少数民族自我发展能力的构成，调动少数民族自我发展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概况

在本研究作前期文献梳理的过程中，笔者不仅认识到了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深感文献资料的丰富与“匮乏”② 及前人研究成果之繁浩，但同时也认识到了“再研究”的必要性。从历史上看，有关安多藏区区域研究的成果很多，但用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民族志的方法进行整体性、结构性研究的成果却并不多。这既丰富又匮乏的研究成果虽不尽如人意，但均为本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也是本研究得以完成的保障。现就历史文献和研究概况做一简要综述：

1. 历史文献评述

(1) 前藏时期

为了研究方便，笔者将 8 世纪吐蕃大规模进入安多之前的安多称为“前藏时期”，即该区域尚未成为藏区之前的阶段。此阶段的主要文献资料是我国正史中有关该区域的记载。主要有：《史

① 指由经济文化系统构成的文化体系。

② 指本项研究。

China

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北齐书》、《北周书》《魏书》、《北史》、《隋书》等，其中有关的资料不多且零散，因此，文献资料的梳理也仅限于涉猎。

(2) 吐蕃化——藏化时期

安多藏区的形成始于吐蕃王朝崛起后的“东扩”，经中唐时期的“安史之乱”，至元代最后成形，此阶段称为安多的吐蕃化时期，即吐蕃——藏民族成为该区域的主体民族、藏文化成为该区域主体文化的“藏化”过程。这个时期是本课题“历时研究”部分的重点，文献梳理较为仔细。

该阶段的史料应该不少，但由于吐蕃王朝崩溃后文献资料丧失殆尽，因此其最直接的资料莫过于吐蕃控制河西、陇右时期遗留下来的敦煌文书，细分则有汉文、藏文两个系统。藏文系统，法国女藏学家检索编定的文书约5000号，整理登录了英藏、法藏吐蕃文书的主体部分，其中就有举世闻名的《吐蕃历史文献》，中国及其他国家收藏的吐蕃文书尚未有完整的登录。这批文书，为一座未经充分开掘的宝藏，有待于敦煌学界、藏学界的开发和利用。

关于敦煌汉文吐蕃史料，《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①] 一文曾作过概要介绍，该文认为，散见于敦煌文书中的吐蕃史料数量不少，如细加钩沉，吐蕃控制河西陇右时期的政治社会情况还可有突破性的进展，此文仅就吐蕃控制时期的职官制度作了初步整理，反映出河西陇右地区境内民族当时经历了一个“吐蕃化”过程，此为安多藏区形成之基础。吐蕃王朝大约与唐王朝相始终，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两大政权，双方和战无常，相持相争了两个多世纪，唐蕃关系成为唐代“备边”的突出问题，也是安多藏区成因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

① 王继光、郑炳林：《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载《中国藏学》，1994 (1)。

China

《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文献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吐蕃史料，成为研究唐代吐蕃和唐蕃关系的主干资料，也是研究安多藏区形成的重要依据，其中唐蕃交锋的主战场河西、陇右的史料尤其丰富，《西藏研究丛刊》、《藏族编年史料集》等几部汉文史料辑录已作了很好的基础。

北宋立国，安多藏区始终处在北方几个少数民族政权（辽、金、西夏）的重压之下，该区域形成了两个吐蕃政权，一个是以青唐城（今青海西宁）为中心的唃厮啰政权，一个是以凉州（今甘肃武威）为中心的六谷部政权，这两个吐蕃政权与宋、辽、金、西夏的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宋、金、西夏各朝文献都有安多藏区的大量史料，其中，史料蕴藏量最为丰富的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清人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其次则有《宋史》、《辽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宋会要辑稿》、《东都事略》、《宋大诏令集》、《太平治迹统类》、《皇宋十朝纲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靖康要录》等等。在这方面，汤开健、刘建丽辑校的《宋代吐蕃史料》（一）、（二）[①] 搜采宏富，悉心校点，不仅是此时重要的参考资料，也是吐蕃社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对安多“吐蕃化”的研究略显薄弱。

（3）巩固与发展时期

元、明、清三朝，是安多藏区形成后的巩固与发展时期，此阶段虽经历了“蒙古化”和部分地区的“伊斯兰化”，但以藏文化为主体文化、藏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安多藏区性质并未改变过。相反，蒙古统治集团对藏传佛教的接受和传播使安多“藏区”的地位更加巩固，对藏传佛教信仰圈和藏文化系统的生成和巩固有重要的辅助作用，部分地区的伊斯兰化使安多文化区域的“多元”

① 汤开健、刘建丽：《宋代吐蕃史料》（一）、（二），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1989。

China

特色更加突出，因此，笔者将元明清三朝时期称为安多藏区和安多文化系统的巩固与发展时期。

该时期的历史文献不仅多且研究范围广而深入。在元代，藏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元西宁王阔端与西藏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晤，确立了全藏区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统辖之下的政治格局，萨迦班智达侄儿八思巴成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受命主持宣政院，总领天下释教。终元之世，萨迦派高僧出任元帝师十四任，受到尊崇，反映这一历史关系的藏文典籍主要有《萨迦世系》、《先祖遗教》、《王统世系明鉴》、《红史》、《布顿佛教史》等藏史名著，蒙文典籍《蒙古源流》等，但涉及安多藏区的具体内容却较少。元代安多藏区的藏文文献相对匮乏，使我们在研究元代安多藏区的历史变迁、民族关系、社会文化等问题时，不得不主要依赖《元史》、《新元史》、《元史新编》等汉文文献，而现存方志中，竟无一部安多藏区的方志，《永乐大典》辑本的《大元一统志》惟缺西北，造成了元代统治安多藏区建置的重大遗憾。这种状况，使我们在元代安多藏区历史、社会文化和民族关系研究中，需要部分地借助于明代史料以“窥其大略”。但元代安多藏区直属中央宣政院辖地，统辖于八思巴之后历代帝师的“政教合一”体制，对此后安多藏区的统治格局，中央政权的治边方略、族群关系的演变、区域文化形态及社会生活等多个层面无不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元明以后，安多藏区的政教史均以此为主线，这也是本研究“历时”研究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但相对于此，该阶段安多乃至整个藏区“蒙古化”的研究显得较弱。

元代也是安多多民族形成、多元文化系统生成的关键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在西征中，从中亚、西亚签发的“探马赤军”不断沿丝绸之路入居中国，其中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部族迁入安多藏区，形成了该地区不同的穆斯林族群。安多藏区族群变迁中的

China

穆斯林民族即于元代开始出现。此阶段安多部分地区经历了一个“伊斯兰化”过程，是河湟地区[①] 伊斯兰教信仰圈和伊斯兰文化系统形成的开始。明代治理安多藏区，在“承之旧制”的基础上，曾经不断调整，有不少创新，是安多藏区由分治而趋统一的演进阶段。清修《明史》，史家们已经注意到安多藏区在明代治藏政策中的特殊地位，因之在《明史·西域传》中，专设《西番诸卫传》，而这一专传实际上是17世纪中叶我国第一部元明安多区域史。该文献从中央王朝对安多经营管理的角度记录了元明安多藏区的历史变迁，是研究安多藏区区域文化与整个文化区域族际关系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此外，明代设“西番诸卫”于安多藏区，土流参设，僧俗并用，垄断茶马贸易，实施军政合一的边卫机制，绝非一时之举，而是出于强化中央集权“混一海内”的大局，明朝曾在安多藏区实施过“设府”、“设县”的尝试，然不久即罢。这一艰难历程也表明，安多藏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及其宗教背景使明朝无法像中原内地那样实施有效的地方行政管理，终明之世，安多藏区仍然保持着朝廷统辖下的某种特殊地位，但正因为明代对安多藏区的积极治理和苦心经营，才造就了清代中期安多藏区逐渐郡县化的态势。研究此时的文献资料首推明代史料蕴藏量最为繁富的明历朝实录，其藏文史料已由《西藏研究丛刊》之八《明实录藏族史料》刊出，举凡明代治藏措施，中央与地方联系，部族分布，经济生活，宗教状况及民族关系等重大问题，都有详尽可靠的记载[②]，其中，安多藏区的史料比重较大。其次的基本资料为：《明史》、《明经世文编》、《大明一统志》、《大明会典》、《续文献通考》、《天下郡国病书》及明人文集、笔记、方志等，以上均为研究安多族际

① 此指狭义的河湟地区，即河州与湟水流域。

② 西藏研究编辑部：《明实录藏族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China